

元中叶西北“过川” 及“过川军”新探

李治安

摘 要：元代与大漠相关的木怜站道、纳邻站道和哈密力东西站道，皆出现了被称为“川”的地段。蒙古语čul~čöl在与汉字“川勒”发生对译联系之际，主要指谓“荒漠、石川”。大德四年漠北宗王、驸马使臣南下传达“迤北军情声息”和“术伯大王军马”奉命“征进”漠北时的“入川”、“过川”等，无疑是穿越亦集乃路以北戈壁石川的纳邻站道。此乃西北军旅和使臣等所“入”所“过”的第一处戈壁石川，亦属与云南建都纳怜、甘肃纳怜并为三纳怜站道的通往岭北行省的纳怜站道。仁宗朝前后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又是战争或和平时双方军队进退和使者、商旅往来的必经通道。延祐二年六月嗣幽王喃忽里奉仁宗圣旨向西进攻察合台汗国时所“入”所“过”的，正是这第二处戈壁石川。至大四年四月“甘肃过川军”所过之“川”，并非川蜀，与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灵枢“过川”东归同样，当是穿越哈密力东西的戈壁石川。

关键词：元中叶 西北主干站道 川 过川军

有元一代，横亘在今蒙古国南部的大漠戈壁，大致把蒙古草原分割为漠北、漠南及漠西三部分。在漠北蒙古本土和漠南之间长期依赖帖里干、木怜、纳邻三站道，漠南与漠西察合台等藩国之间则依赖哈密力东西站道，往来交流通行。而这些站道上地貌为荒漠戈壁的地段，元人或称之为“川”。穿越荒漠戈壁地段，俗称“入川”、“过川”。《元史·仁宗纪一》还留有“甘肃过川军”等记录。^①关于帖里干、木怜、纳邻等站道及站赤情况，陈得芝、周清澍、陈高华等先生已做过精彩的考证，^②但对穿越荒漠戈壁的诸站道之“川”论及较少，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元朝西北军队、使臣及商旅“入川”、“过川”的具体情况如何，“过”的是哪几个“川”，“甘肃过

① 《元史》卷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四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2页。

②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8页；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7—270页；亦邻真、周清澍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0—136页；胡小鹏：《元甘肃行省诸驿道考》，《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287—288、295—297页。

川军”究竟指谓哪些军队，均值得认真探讨。这并非简单的西北历史地理及军队名号问题，而是和元帝国与察合台汗国东西交通、西北主干站道荒漠“咽喉”地段的往来实态、元中叶西北用兵等密切关联的问题。兹综合运用黑水城出土文书及其他文献资料，予以初步考辨。

一、“川”之涵义及大漠相关诸“川”辨析

首先，辨析元代汉语、蒙古语“川”一词的涵义及大漠相关诸“川”，以为全文讨论的前提或铺垫。

通常，“川”一词有两种涵义：一曰平野、平地，二曰水道、河流。《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①这里敕勒川之“川”，是偏于平野、平地，大致是指今大青山南麓的草原平野地带。^②《周礼·考工记》：“两山之间，必有川焉。”^③此处“川”乃指谓水道。川蜀或四川之“川”，也当偏重于两山之间水道之意。

元代与蒙古相关的词汇“川”和北地大漠“川”的实际形态，亦有两种：一是与地名前后连缀的“川”，一是单独出现的“川勒”。

1. 第一种形态——与地名等前后连缀的“川”

(1) 不刺川

《圣武亲征录》载：“（汪可汗）其后部众稍集……至捕兀刺川。”同书岁癸亥又作“不刺川”。^④《蒙古秘史》第105节和第109节，作“不兀刺 客额列”。^⑤

(2) 八鲁弯川

《元史·太祖纪》十八年“避暑八鲁弯川”。^⑥《圣武亲征录》岁癸未亦曰：“上避暑于八鲁弯川。”^⑦《蒙古秘史》第257节则作“巴鲁安 客额里”。^⑧

(3) 萨里川

《元史·太祖纪》载二十二年七月“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⑨《圣武亲征录》或作萨里河，或作萨里川。《蒙古秘史》第128节、第161节等作“撒阿里 客额列”、“撒阿里 客额儿”。^⑩

(4) 帖麦该川

① 洪迈：《容斋随笔》卷1《敕勒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5页。

② 亦邻真、周清澍等《内蒙古历史地理》云：“5世纪20年代，贝加尔湖一带的敕勒人被战败，30余万户被北魏南迁到东起濡源（今河北丰宁县西），西至五原阴山，幅员3000里的漠南地区，今内蒙古乌盟兴和县以西至巴盟五原县一带，都曾分布有敕勒人。由于敕勒人的长期驻牧，呼和浩特平原又被称作‘敕勒川’。”（第58页）

③ 《周礼》卷12《考工记下·匠人为沟洫》，《四部丛刊初编》，0014第6册，第29页A。

④ 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0页B、41页A。

⑤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168页。

⑥ 《元史》卷1《太祖纪》，第22页。

⑦ 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78页A。

⑧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760页。

⑨ 《元史》卷1《太祖纪》，第3、25页。

⑩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223、343页。

《元史·太祖纪》云：“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①《圣武亲征录》一作“帖麦该川”，一作“帖木垓川”。^②《蒙古秘史》第190节，作“帖蔑延 客额里”、“帖蔑延 客额儿”。^③

从以上史料不难窥见，此种形态的“川”具有三个特征：

其一，“川”之前，与不剌、八鲁弯、萨里、帖麦该之类的地名等相连缀。

其二，不剌川、八鲁弯川、萨里川和帖麦该川，都能在《蒙古秘史》中找到相应的蒙古语汉字音写。它们分别是“不兀剌 客额列” Bu'ula ke'el、“巴鲁安 客额里” Balu'an ke'eli、“撒阿里 客额儿” Sa'ali ke'el 和“帖蔑延 客额儿” Teme'en ke'el。

其三，与汉字“川”相对应译的是蒙古语“客额儿” ke'el，《蒙古秘史》旁译作“野甸”。另，《至元译语·地理门》：“野甸，怯歇儿”；《华夷译语·地理门》：“野，客额儿”；《鞑靼译语·地理门》：“野，克额儿”。^④ 怯歇儿、客额儿与克额儿，皆为同一蒙古语 ke'el 的略有差异的汉字音写。显然，此汉字“川”充当蒙古语“客额儿” ke'el 的译语时，是偏重于原有平野、平地的第一种词义。

以上不剌川、八鲁弯川、萨里川和帖麦该川等四词，属于蒙古地名与汉字“川”前后连缀的词汇形态，因大抵是漠北蒙古本土地名，^⑤ 与本文所讨论穿越大漠的站道，关系无多，故仅略作以上说明，恕不赘言。

2. 第二种形态——单独出现的“川勒”

“川勒”一词，较早出现于《蒙古秘史》。该书第188节载：

桑昆此时在外，不曾入去。以此就往川勒地面里去了。至川勒，桑昆与伴当阔阔出并其妻一同寻水吃。^⑥

同书第279节载：

……川勒地面先因无水，止有野兽，无人住。如今要散开百姓住坐。可教察乃、畏吾儿台两个去踏验，中做营盘的地方，教穿井者。^⑦

据此，蒙元时期的汉字“川勒”，已和蒙古语词汇因发音及部分寓意近似而发生了另一种音写、对译联系。

村上正二认为，以上蒙古语“川勒”，原文旁译为“地名”，拉丁文转写为čöl~čül。语义是“砂碛”、“沙漠”。^⑧ 余大钧亦将《蒙古秘史》中的“川勒” (čöl) 译作“荒野”，意为“荒凉、无

① 《元史》卷1《太祖纪》，第12页。

② 王国维校注：《圣武亲征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第52页A、53页B。

③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460、1000页。

④ 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7、97页。

⑤ 王恽：《秋涧集》卷50《大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兀良氏先庙碑铭》载：“壬午年，太祖征回回国……继遣公（速不台）将万骑由不罕川追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册，第104页）。《元史》卷121《速不台传》云：“壬午，帝征回回国，其主灭里委国而去。命速不台与只别追之……其王夜遁。复命统兵万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第2976页）。两种记载中的“不罕川”，大体也属于地名与汉字“川”前后连缀的词汇形态。

⑥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446、998页。

⑦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第845—846、1054页。

⑧ 村上正二译注：《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ギス・カイ物語》（二），东京：平凡社，1970—1976年，第230页。村上氏还指出：“川勒”一词，在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等辞书中附带有“泥”、“粘土”、“污秽”等义。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含有“人不能栖息的荒芜地”等义。在14世纪蒙古语·阿拉伯语辞典中的伊布·木哈那，含有“沙漠”之义。《汉译佛典》中则为“旷野”。据拉施德说，此词汇还传入了波斯语。

人居住的旷野”。^①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蒙汉词典》收入čöl 一词，并直接释作“旷野”、“荒野”、“僻野”、“荒漠”，形容“荒凉的，无人烟的，寂寞的”。^② 陈得芝在考察木怜站道时曾指出：“第三段，过天山而北，经净州，出沙井，入‘川’（译言‘沙漠’）中……木怜道兴和路和河东宣慰司境内的苦盐泊至燕只哥赤斤、阿察火都至宽迭怜不刺等站，北与‘川’中察罕愁赤海等站接运，而‘川’中察罕愁赤海、察罕忽鲁浑、阿失不刺等又接连岭北一道。”^③ 陈先生首次揭示木怜站道中存在“川”地貌及若干站名，同样是把“川”视作蒙古语，且翻译为“沙漠”。

笔者注意到，在元明蒙、汉语互译常见文献中，《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地理门》载：“川，噶勒格”，拉丁文转写作čulge；《鞑靼译语·地理门》：“山川，噶勒”；《蓟门防御考》译语：“川，扯喇”。^④ 而沙漠，在蒙古语中另有特定词汇。《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地理门》载：“沙漠，忽麻黑噶勒”，拉丁文转写作 qumaq čül。“忽麻黑”（qumaq~qumaki），又作“忽麻乞”、“忽麻奇”和“苦马乞”，恰恰是汉语“沙”的意思。^⑤ 足见，把蒙古语čül~čöl，简单翻译为“沙漠”，似乎不很周全。čül~čöl 一词，比较确切的意思，应该是“荒漠”、“砂碛”。

蒙古语“川勒”čül~čöl 在与汉字“川”发生对译联系之际，可能兼取了汉字“川”平野和山间通道两种词义，入元前后又根据蒙古高原生态地貌实际，增添无水源和无人烟等荒漠寓意，逐步形成了和汉语“川”发音近似，且指谓“荒漠、石川、戈壁”及山间通道的蒙古语čül~čöl。诚然，蒙古语čül~čöl 与汉语“川”二词的发音，还是存在细微差别的。汉语“川”，《广韵》属平声，仙韵，昌母；《中原音韵》属先天韵，平声阴，^⑥ 声调也与现代普通话相近。蒙古语čül~čöl 的汉字音写，则接近于入声，故而出现《蒙古秘史》、《华夷译语》中“川勒”或“噶勒”的较严格音写形式。

此种被称为“川勒”的“荒漠”、“砂碛”，大致有两个特征：一是地貌主要呈现为沙漠戈壁，无水源，亦无人烟。此乃“川勒地面”的地理生态基本特征。二是地势平缓或为山脉缺口，易于车马通行。《鞑靼译语·地理门》：“山川，噶勒。”^⑦ 或显现其山脉缺口的面貌。

笔者又注意到，元代与大漠戈壁相关的四站道中三个，即木怜站道、纳邻站道和哈密力东西站道，不约而同地见到了单独出现“川勒”的记载，且都属于“川勒”地貌。关于木怜站道中“川”之地貌，宋人彭大雅等描述说：“出沙井天山县八十里，则四望平旷荒芜，际天（闲）（间）有远山。初若崇峻，近前则坡阜而已，大率皆沙石。霍所见沙石，亦无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⑧ 亦集乃路以北和哈密力东西的以戈壁为主的地貌，与木怜站道的“荒漠”、“砂碛”略有不同。“川勒”的一般词义“荒漠”、“砂碛”，在上述两地又突出表现为石川戈壁。正如《中

①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85 页。

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写：《蒙汉词典》（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291 页。

③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 13 页。

④ 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华夷译语（鞑靼馆下续增）·地理门》，第 61 页；《鞑靼译语·地理门》，第 97 页；《〈武备志〉收〈蓟门防御考〉载〈蒙古〉译语》，第 152 页。

⑤ 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华夷译语·地理门》，第 26 页；《鞑靼译语·地理门》，第 97 页；《〈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地理门》，第 132 页。

⑥ 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51 页；杨耐思：《中原音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34 页。

⑦ 贾敬颜、朱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第 97 页。

⑧ 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王国维遗书》第 13 册，第 3 页 A。

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I·0861 所载：“本路所辖站赤，沿路沙漠石川，相难远穹。”^① 哈密力东西的站道亦有“西边过川两界”和“彼方川石之地”等描绘。^② 亦集乃路以北的石川沙漠，正与卫星影像上的今蒙古国南部“中央戈壁”的方位相符。^③ 哈密力东西的“川石之地”，又大抵属于今吐鲁番——哈密间山盆地亚区最干旱、戈壁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地段。^④ 就三处“川勒”地貌的实际状况而言，具体释为“荒漠、石川、戈壁”及山间通道，似乎更贴切些。

换言之，本文讨论的西北“过川”之“川”，主要是指谓“荒漠、石川、戈壁”及山间通道的蒙古语 *čul~čöl*。

二、亦集乃路纳邻站道的使臣、军旅等“入川”、“过川”

《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编号 MI·0295 的汉文文书载：

皇帝圣旨里，亦集乃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六月□

蛮子歹驸马^⑤位下使臣帖失兀、

海山太子^⑥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过，赴

术伯大王^⑦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在仓粮斛数少，旦夕不□□

大王大军经过迤北征进，到于本路，支请口粮，委是不敷支遣。又□

处人民所种田禾将欲出穗，却被蛆虫食践，未见收□□

特已于五月廿四日、六月十八日二次差人赍解，赴

省计禀，攒运粮斛，准备支持去后。今有廿二日有使臣帖失兀、阿鲁灰，

术伯大王位下复回说称，

术伯大王军马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面粮等事。本路□

系小麦一色，又兼数少，委是不敷，申禀早为于甘州等□

运米麦前来，供给支持，不致耽误军储，去讫

术伯大王位下使臣也帖立、秃思不花等赴

晋王^⑧位下传奉

脱忽帖木儿大王、

①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卷 5（军政与站赤文书卷）之《提调站赤文书》、《在城并马兀木南子山口普筑四站增添驼只》，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1084 页。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131：W8，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75 页。

② 《永乐大典》卷 19421，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8 册，第 7232 页上。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第 586 页附“中国西北部卫星影像”。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第 545 页。

⑤ 弘吉剌部首领特薛禅孙，按陈子，至元二十七年袭万户，先后尚鲁国大长公主、世祖女囊加真和裕宗女喃哥不剌，元贞元年，封济宁王。（《元史》卷 118《特薛禅传》，第 2916 页）

⑥ 答剌麻八剌长子，大德八年封为怀宁王，出镇称海，十一年南归即皇位，为武宗。（《元史》卷 22《武宗纪一》，第 447—448 页）

⑦ 又作出伯，察合台后王，阿鲁忽之子。（参见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 6 章，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 年，第 242—287 页；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 2 章《河西的察合台系诸王》，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 年，第 22—67 页）

⑧ 嗣晋王也孙铁木儿。至元二十九年，其父甘麻剌由梁王改封晋王，出镇漠北。大德六年，甘麻剌卒，也孙铁木儿袭封晋王。（《元史》卷 29《泰定帝纪一》、卷 115《显宗传》，第 637、2894 页）

脱忽答大王令旨，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面□

敬此。

一申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得先□□

粮并支持扫里^①钞定，已行差□□

省计禀去讫，未蒙

明降，今敬前因，合行作急□

照详早赐，照例

明降付下施行，仰望不致失

一差 站马户 卜普极合□□

差本城起马一匹，前□□

省计禀回日缴纳讫。

大德四年六月 日 府吏□

为军粮扫里钞事 提控案牘冯□

知 事李□

经 历□^②

这是一件大德四年六月亦集乃路总管府禀报甘肃行省请求调拨军粮和驿站支应钞锭的公文。其中含有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经亦集乃路传达的宗王令旨及术伯大王位下使臣也帖立和秃思不花等回复，内容不外是：因“迤北军情”，“术伯大王军马经由本路入川征进，准备炒米”，等等。所谓“迤北军情”，大抵是大德四年前后，西北叛王海都、笃哇入寇蒙古本土，战事紧急，元成宗“遣晋王甘麻剌并武宗帅师讨之”，共同防范抵御海都等叛王，^③如大德四年八月元军曾与海都“战于阔别列之地”，翌年八月又在迭怯里古发生激战。^④前揭文书中出现的“海山太子位下使臣”、“赴术伯大王位下为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以及“晋王位下”等文字，亦表明“术伯大王军马”是奉命由亦集乃路北上“征进”漠北，去参加元军大德四年八月阔别列等地元军与海都的作战。

公文中所谓“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过”向术伯大王传达“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具体指自漠北称海、和林南下穿越大漠，严格地说就是“过川”。所谓“入川”，就是自亦集乃路进入通向漠北和林的戈壁石川。^⑤《元史》卷60《地理志三》记载：“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磧。”^⑥此“沙

① 扫里，又作扫邻，蒙古语 sa'uri~sa'rin，意为座位、住处。参见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②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卷2（钱粮文书卷），第398—400页；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116：W552，第139页。文书中“□”表示缺一字，而“□”表示缺两字以上。另，二书个别文字有出入，今从前书图版。下同。

③ 参见《元史》卷118《孛秃传附忽怜传附阿失传》、卷119《博尔忽传附月赤察儿传》，第2923、2950页。

④ 《元史》卷22《武宗纪一》，第477页。

⑤ 附带说说“入川”与“过川”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入川”与“过川”是有区别的。大抵以甘肃行省治所甘州路或亦集乃路为方位基准，“入川”是指入去西部或北部边境的石川，“过川”是指自石川过来。但个别情况也有例外。譬如，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116：W160载：“佰壹拾柒口过川不得回来了”云云。此处的“过川”，显然与“入川”相混淆，都是泛指经过、通过石川，而不存在入去、过来的细微区别了。

⑥ 《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1451页。

磧”即为石川。李逸友详细解释说：石川系指戈壁，现今横亘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西部接壤的地带，为一片广袤的大戈壁，也就是汉代所说的瀚海。自亦集乃路通往和林的驿路，必须穿过这片戈壁滩，才能深入蒙古高原的腹地。^①《经世大典·站赤》亦载：“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二站，山外口至本路五站。”^②此“川口”，无疑是《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MI·0296文书中提到的“本路置在极边，接连川口”之“川口”。^③其方位恰处在亦集乃路北赴和林的纳怜站道戈壁石川的南端，亦即自亦集乃路北面进入戈壁滩的入口处。见于《黑城出土文书》亦集乃路附近的纳怜站道共计在城站、盐池站、普竹站、狼心站、即的站、马木兀南子站、山口站、落卜克站等蒙古八站。^④据有关研究，“在城至川口”的城北两站大致是盐池站、落卜克站。^⑤具体地说，自亦集乃路北上，经盐池、落卜克两站和川口，即进入戈壁石川。^⑥

《马可波罗行纪》对此戈壁石川亦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

从此甘州城首途，若骑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Edzina）。城在北方沙漠边界，属唐古忒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颇有骆驼牲畜，恃农业牧畜为生。盖其人不为商贾也。其地产鹰甚众。行人宜在此城预备四十日粮，盖离此亦集乃城后，北行即入沙漠。行四十日，冬季酷寒，路绝人烟，亦无草木。唯在夏季始见有人。其中亦见野兽，缘有若干处所有小松林也。^⑦

《马可波罗行纪》所言此站道地貌等情状基本属实，其“行人宜在此城预备四十日粮”句，值得注意。《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编号MI·0267载：“依术伯大王入川炒米两石”。“两石”约240市斤，每人日平均3市斤，大致也是“四十日粮”的两倍。估计是还要为抵达漠北后准备部分口粮。此条穿越亦集乃路以北戈壁石川的站道，途中人烟稀少，无法补充食物等，主要供军情使者和军队往来通行，恰符合《经世大典·站赤》公文中“专备军情急务”，“今后除悬带金银字牌面，通报军情机密重事使臣，使行纳怜站道”等规则。^⑧

此外，《元史》卷15《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五年正月癸卯“敕驸马昌吉、诸王也只烈、察乞儿、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术伯北征”，^⑨也应该是自亦集乃路以北的戈壁石川进军的。

足见，大德四年“蛮子歹驸马位下使臣帖失兀、海山太子位下使臣阿鲁灰本路经过”向术伯大王传达“迤北军情声息勾当等事”和“术伯大王军马”奉命率军队赴漠北时的“入川”、

① 关于“石川”的详细解释，参见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黑城出土文书概况（第30页）以及陈得芝的《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13页。

② 《永乐大典》卷19419，大德五年九月，第8册，第7219页下。

③ “川口”见《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卷2（钱粮文书卷）之《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MI·0296，第403页。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军用钱粮类·大德四年军用钱粮文卷F116：W553，第138页。

④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卷5（军政与站赤文书卷）之《在城盐池普竹狼心即的马木兀南子山口落卜剌等八站季报名录》，第1087页。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2：W65，第174页。

⑤ 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黑城出土文书概况”，第31页。

⑥ 参见丛海平：《〈黑城出土文书〉所见海都之乱时期亦集乃路的军粮供给》，《云南师大学报》2009年第4期。

⑦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31页。

⑧ 《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延祐元年十月二十四日，第8册，第7232页上。

⑨ 《元史》卷15《世祖纪一二》，第308页。

“过川”，无疑是穿越亦集乃路以北纳怜站道以及川口以北的戈壁石川。此乃甘肃元军所“入”所“过”的第一处戈壁石川。

顺便说说纳怜站道问题。陈得芝先生认为，“纳怜道的路线大致是出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溯黄河而西，穿过甘肃行省北部，直达西北边境”。周清澍先生主张，纳怜道“即驿路小道，这是东起东胜州，先西行再北转到和林的驿路”。陈高华先生进一步指出：“这条站道以东胜州（今内蒙托克托）为起点，沿黄而西，经甘肃行省东北，到甘州（今甘肃张掖）折向北行，经亦集乃路前往和林。”胡小鹏则说：“甘肃纳怜驿道以亦集乃城为枢纽，北通和林，南连甘州，西抵察合台汗国边境，四通八达，是通报西部边疆军情的专用驿道。”^① 笔者拙见，虽然“纳怜”因其在蒙古语中“小”之词义，通常泛指与大道相对的崎岖艰难的驿站小道，但在不同场合下纳怜站道又至少呈现三处具体指谓：第一处是包含47站的“甘肃纳怜驿”，胡小鹏所云是也。第二处是见于《至正条格》“枉道驰驿”条的自云南行省北赴成都、兴元、安西“通报军情紧急重事”专用的“黎、雅、建都纳怜站道”。^② 第三处则应主要指前述自亦集乃路北上穿越荒漠戈壁通向漠北和林的站道。《元史》卷58《地理志一·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所云“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处”中的纳怜，即为第三处纳怜站道。换言之，“甘肃纳怜驿”、“黎、雅、建都纳怜站道”和北赴岭北行省纳怜站道，并为元帝国的三纳怜站道。根据以上三处不同区位场合，去阐释元代的纳怜站道，或许更接近历史真相。

三、哈密力附近的军队、使臣等“入川”、“过川”

《经世大典·站赤》载：

（延祐元年闰三月六日），中书省奏：“宽彻言：塔失之城（引者注：即塔失八里，今新疆哈密市东北石城子）立站，去年奏准，支給骆驼一百只、马三百匹，以充转送。随有使臣自哈儿班答（引者注：伊利汗国嗣君）来进豹子者，尽数起发铺马。其时马驼方从远来，膘力未充。过川其间，毙者太半，未免将军人马匹当站，今存者又无几矣。臣等议：谓死损铺马，不可不补置之。如令行省官验其倒毙之数，给价和买补置，庶几便当。”上从之。又奏：“哈儿班答、也先不花（引者注：察合台汗国嗣君）等使臣进送葡萄酒，来者实频，驿传劳费。乞谕典酒之官，今后如何较量供送，与都护府官议奏裁处”。奉圣旨：“准”。^③

同书延祐元年（1314）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十八日又载：嗣幽王南忽里所掌河西军站，位于

①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蒙元史研究丛稿》，第4页；周清澍：《蒙元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元蒙史札》，第269页；亦邻真、周清澍等：《内蒙古历史地理》，第136页；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胡小鹏：《元甘肃行省诸驿道考》，《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第230页。

② 《至正条格》卷5《断例》，“枉道驰驿”条载：“延祐七年四月，兵部译得：‘黎、雅、建都纳怜站道，本以通报军情紧急重事，闲慢使臣、回任人员，往往不行经由新开、永宁、乌撒等处驿路，径直前来成都，靠损倒断站赤。今后云南省差使，事干军务，必合赴成都、兴元、安西等处勾当，经行建都纳怜站道。其余缓慢人员，如有违犯，以枉道例断罪。脱脱不孙不行盘诘，减等治罪。’都省准拟。”（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校注本，第210页；影印本，第68页）又，校注本的相关标点为：“黎雅、建都、纳怜站道”，欠妥。黎指黎州，雅指雅州，建都是罗罗斯的土名，前后相连，当是途经黎州、雅州和建都的纳怜站道之意。故笔者重新标点为“黎、雅、建都纳怜站道”。

③ 《永乐大典》卷19421，第8册，第7231页上。

“答失城”（今哈密东北石城子）一带的“西边过川两界，军人马匹传送频数，物力消乏”。中书省官员两次奏言：“彼方川石之地，马驼之毙可知。若不补置，必损军力。”^①

此处的“过川其间”、“西边过川两界”和“彼方川石之地”等，指谓仁宗朝前后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哈密力（今新疆哈密）东西的石川戈壁，大抵属于今吐鲁番——哈密间山盆地亚区最干旱、戈壁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地段。^②这一地段虽然艰险，淡水和食物供应困难，容易造成铺马大量死损，却是当时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往的必经之路。在双方军事对峙或攻防作战之际，此处是元朝军队常用的行军通道。而在平时时期，元朝与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等使者、商旅等也需要依赖这一必经通道彼此交流往来。

又，《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泰定三年五月乙巳载：“甘肃行省臣言：‘赤斤储粟，军士度川远给不便，请复徙于曲尤之地。’从之”。^③

根据李正宇初步研究，赤斤即今玉门市西北郊的赤金堡，曲尤即《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肃镇华夷志》卷1《西域疆里》中的苦峪。《肃镇华夷志》详载：“赤斤西二百里至苦峪城……苦峪西一百二十里至王子庄城……庄西八十里至卜隆吉河，俗名川边河”。^④元王朝在甘肃以西的实际控制区在不同时段内东、西进退空间幅度很大，世祖至元初最西可控制阿力麻里，元成宗朝一度放弃吐鲁番、哈密及瓜州、沙州等东撤。由于仁宗延祐二年元军向西攻占哈密力，随之得以重新收复和控制其东的瓜州、沙州一带。所以，其后作为供给“军士度川”粮食储备的“赤斤储粟”仓库，泰定三年五月“复徙于”今甘肃省玉门市西北郊的赤金堡西约二百里“曲尤之地”，应是合乎情理。笔者特别注意的是，前揭《泰定帝纪二》中的“军士度川”和《肃镇华夷志》“川边河”等记载。这里的“川”及“川边”，应该就是指谓瓜州、沙州及曲尤以西通往哈密力的戈壁石川。今甘肃省安西县西与新疆哈密市交界的星星峡及峡东等地，估计都在此戈壁石川范围内。

接着看《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仁宗延祐二年“入川”、“过川”的一件史料：

皇帝圣旨里，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据畏兀儿字译读行□

火者文字里说有。在先

暖忽里入川去呵，炒□面这□今奉

□入川去的时分，

□里根底，依在先与来的体例□嗦有。怎生？行与亦火□

者。得此，照得，延祐二年六月初一，据肃州路中，忽都伯□

暖忽里幽王入川炒米面，依

术伯幽王入川的例与者。申□□以此照得，至元廿六年

术伯大王入川炒米面两石面□本处税粮并仓屯□

幽王入川炒米面，照依□行札付肃州路亦只失

本位下收管去讫。今□省府合下仰照验明□

就支

① 《永乐大典》卷19421，第8册，第7231页上、7232页上。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第545页。

③ 《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第669页。

④ 李正宇：《“曲尤”考》，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489—498页。

本位下收管，年终通行照算施行□

右札付亦集乃路总管府。准此。^①

这是延祐二年甘肃行省就“暖忽里鹵王入川炒米面”转发给亦集乃路总管府的一道札付公文。“暖忽里鹵王”，即术伯子、嗣鹵王，又作喃忽里。“暖忽里”与“喃忽里”，是蒙古语 Nam-quli 的同名异译。表面上看来，因为有“依在先与来的体例”和“鹵王入川炒米面”等语，此次“暖忽里鹵王入川”，似乎与其父术伯大德四年（1300）及至元二十六年（1289）同样，也可能是由亦集乃路进入通向漠北和林的戈壁石川的。

然而，现有五条史料或信息，足以支撑一系列反证：

第一，术伯等河西总兵宗王统领的西部军马，除了前述特别说明的大德四年和至元二十五年两次奉命北征外，更多的军事活动是“耀武”西陲，与西部察合台汗国笃哇等对抗作战。如成宗元贞元年二月，忙汉奉命领探马赤军“偕哈伯元帅从宗王出伯西征”等。^②而且，因西征等军事活动频繁，往往不特别说明，北征则次数颇少，故需要特意说的比较清楚。前揭《大德四年军粮文卷》编号 MI·0259 的汉文文书明确讲“为迤北军情”及“海山太子”、“晋王”云云，延祐二年公文则只字未提。

第二，此延祐二年公文内，有“据肃州路申”，“札付肃州路亦只失□本位下收管去讫。今□省府合下仰照验明□就支本位下收管，年终通行照算施行”等文字，仅在末尾有“右札付亦集乃路总管府”等 10 字。很像是由肃州路总管府申报和甘肃行省责成肃州路总管府具体办理。由于术伯大德四年及至元二十六年“入川炒米面”事与亦集乃路相关，故而同时抄送转发给亦集乃路作为惯例公文存档。

第三，根据胡小鹏的研究，术伯、喃忽里父子的领地在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沙州、瓜州和曲尤一带。其率军镇戍地原先在哈刺火州至吐蕃一线，成宗朝东撤。^③延祐二年公文内“肃州路”恰与其领地及东撤后镇戍地沙州前线接壤。另，延祐二年公文内有“本位下收管去讫”、“就支本位下收管”等语，应该指谓嗣鹵王南忽里位下，表明此次“暖忽里鹵王入川炒米面”事宜，无论责成办理的肃州路和“就支”、“收管”的南忽里“本位下”，都在肃州路及以西。

第四，前揭《经世大典·站赤》延祐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十八日载：嗣鹵王南忽里所掌河西军站，位于“答失城”（今哈密东北石城子）一带的“西边过川两界，军人马匹传送频数，物力消乏”。中书省官员两次奏言：“彼方川石之地，马驼之毙可知。若不补置。必损军力。”故提议在“曲尤、沙州、瓜州上户内，金补一百户”，还要求甘肃行省“与南忽里差人收聚”“灭吉怜民有散居各处者”，“悉令当站”。仁宗降圣旨批准。^④此处的“西边过川两界”和“彼方川石之地”，应当是仁宗朝前后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哈密力（今新疆哈密）东西的石川沙漠。诚然，作为戈壁中通道的石川，应该和当地的驿传站道基本重合。《永乐大典》载：中统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⑤此处的“川”，应当指谓戈壁石川。因明言其位置在“西夏之西”，故亦即

①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卷 2（钱粮文书卷）之《军用钱粮文书卷》MI·0267，第 369 页；李逸友编著：《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F116：W561，第 136 页。

② 《元史》卷 18《成宗纪一》，第 391 页；卷 122《按扎儿传附忙汉传》，第 3007 页。

③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 39、40 页。

④ 《永乐大典》卷 19421，第 8 册，第 7232 页上。

⑤ 《永乐大典》卷 19417，第 8 册，第 7196 页上。

蒙元哈密力附近及以西一带。据有关研究,塔失八里,又作“答失城”,即今哈密东北70里之石城子。揽出去站,在今哈密西之拉布楚喀。^①黄兀儿于量站,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考订为霍努儿乌连河及“黄草泊”,位于今新疆西北部艾比湖一带。^②胡小鹏指出,黄兀儿于量站附近仅是世祖至元七年、二十八年及顺帝初元王朝尚能控制,其他“大多数时间元朝的势力并不可能达到这一带”。^③所言甚是。至元八年,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统领大军建幕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④至元二十九年之际,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一带依然发生过元军将领明安与四千“贼军”的军事冲突。^⑤但是在成宗朝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元军就放弃哈刺火州等一带而东撤。所以,仁宗朝前后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沙漠,应该具体指谓哈密力附近的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

第五,刘迎胜依据波斯文资料的相关研究表明,延祐初,仁宗曾下令西北元军分两路进攻察合台汗国。他引用波斯史家哈沙尼《完者都史》说:“当合罕(元仁宗)的‘把敌人从自己的禹儿惕驱走,夺其夏营地和冬营地为我所有’的圣旨到达后,脱火赤的军队扫荡敌军达三月之程之远,并置之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术伯之诸子的军队则[驱敌达]四十日程,直至占据了合密里,叛军远离了自己的禹儿惕为止。”还指出所谓“术伯之诸子,无疑指宽彻等人”。^⑥笔者赞同其见解,同时做一点补充:前揭《完者都史》中的“术伯之诸子”,除了宽彻,还应该包括嗣幽王喃忽里。因为喃忽里是术伯之子,宽彻是术伯之侄、合班之子。泰定三年喃答失太子所立《有元文殊寺碑铭》曰:术伯死后,喃忽里及其子喃答失先后嗣位,“以上诸王皆坐叉合歹金轮宝位”。^⑦喃忽里于至大元年(1308)十一月受金印,迄延祐七年已嗣幽王爵,宽彻则晚至文宗天历二年(1329)八月另受封肃王。^⑧可证喃忽里继其父术伯之后担任元朝方面察合台后王之首领。其在官方诏令公文中的位置一般也在肃王宽彻之上。所以,前揭“术伯之诸子”,应具体诠释为喃忽里、宽彻等。如果这种诠释得以成立,延祐初奉仁宗旨意率河西大军从沙州、肃州向西越过当时的边界,进攻察合台汗国且占领哈密力等地的,同样应当是以嗣幽王喃忽里为首。

还需要强调的是,前揭波斯文《完者都史》等记载,元军是分两路进攻也先不花为首的察合台汗国的。一路扫荡也先不花军三个月程之远,攻至赤麦干及铁门关,^⑨另一路扫荡敌军40日程,攻占合密里(哈密力)等。嗣幽王喃忽里所率军驻戍沙州前线,以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为界与察合台汗国军对峙,双方空间距离较近,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绕道亦集乃路通向漠北和林的戈壁石川。因为脱禾出(又作脱火赤)所率漠北元军主力发动攻势时已驻戍阿尔泰山西麓,幽王喃忽里率军绕亦集乃路赴漠北并尾随其后,至少需要增加两个月的路程。况且,

①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237页;党宝海:《蒙元驿站交通研究》,第296页。

②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7章,第307页。

③ 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237页。

④ 《元史》卷63《地理志》,第1569页。

⑤ 《元史》卷135《明安传》,第3281、3282页。

⑥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3页。

⑦ 参阅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第7章,第242—287页;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第34—39页。

⑧ 《元史》卷108《诸王表》,第2738、2743页;卷22《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十一月乙丑,第504页;卷33《文宗纪二》天历二年八月戊申,第739页。

⑨ 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铭》,《虞集全集》,王昶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下册,第1022页。

自当时河西元军驻戍的沙州前线直接西进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沙漠,攻取哈密力等察合台汗国领地,既是元仁宗圣旨分南、北两路进攻的意思,也符合地理路程便捷等实际情况。

鉴于以上五条史料的反证,无论是黑水城文书本身、肃州和沙州以西石川方位和波斯文等相关记载,均可证实:前揭 MI·0267 延祐二年六月文书所云“暖忽里鹵王入川”,自亦集乃路进入通向漠北的戈壁石川的可能性极小。此次暖忽里“入川”,当是自沙州前线就近进入哈密力附近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带的戈壁石川,向西攻击察合台汗国。这应该是延祐二年甘肃元军所“入”所“过”的第二处戈壁石川。

四、关于汪古部阔里吉思灵柩“过川”与至大四年“甘肃过川军”

关于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灵柩“过川”东归葬先茔,刘敏中撰《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载:

今封皇姊赵国长公主一子术安,即赵王,继出也。初,忠献之北,赵王尚幼,王弟术忽难袭爵为高唐王。武宗至大元年,封郃王。明年,薨。世子术安袭爵郃王。三年,帝思忠献之忠,加封术安赵王。赵王尚皇伯晋王女阿剌的纳八刺,封赵国公主。赵王一日召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谓曰:“先王旅殡卜罗沈寥之乡,神灵将畴依,吾疚心欲无生。若请于上,得归葬先茔,瞑目无憾矣”。二人白之知枢密院事也里吉尼,以闻。帝嗟悼久之,曰:“术安孝子也”。即赐阿昔思黄金一饼,得率王傅脱欢之子、人匠总管八失忽都鲁,王傅术忽难之子、怯怜口都达鲁花赤阿鲁忽都,断事官也先、昔班、竹忽真、马黑答阿的、帖木儿等十九人,乘传以往。复以钱五百缗赐从者。五月,过戍边。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假卒五百人卫其行。七月,达殡所。奠告启视,王体如生。乃以龙沙木柩易衣衾敛之。众哭,卜罗人观者千余,亦皆哭。已,乃奉柩以东。八月,至也里可儿思其先茔。王傅脱欢、府尉也不干、典食司那合、常侍脱因忽里、怯怜口副总管答剌罕来会葬,胥裹事而还。^①

刘敏中《碑铭》所述嗣赵王术安派家臣 19 人,偕 500 兵卒西赴卜罗(今新疆博乐市西)迁葬其父阔里吉思骸骨事中,有如下五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至大三年去程取道漠北且行走缓慢。就当时元军西北驻戍、所控制的驿路及月赤察儿、脱禾出借与军卒看,去程“乘传以往”大抵走的是漠北称海——阿尔泰山路线。据有关记载,当年五月前后,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所率元军“戍边”前线大约在漠北称海以南、阿尔泰山北麓的阿答罕三撒海一带。^②如此,迁葬人员途经漠北和到达称海后前往殡所“卜罗”

① 刘敏中:《中庵集》卷 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300 页。

② 元明善:《清河集》卷 2《太师淇阳忠武王碑》载:“至大元年,遣使奏曰:‘诸王秃克灭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笃娃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奏入,上曰:‘是谋甚善,公宜移军阿答罕三撒海地。’王既移军,察八儿、秃克灭欲奔款彻,不敢纳,去留无所,遂率众来降,于是北边以宁。”(《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 5 册,第 169 页)“宜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意即安置笃娃之子款彻等归附部众于阿勒泰山南麓。月赤察儿奉旨“移军阿答罕三撒海”的具体地望虽不详,但武宗海山既然称赞“是谋甚善”,该地肯定在“金山之北”,即称海以南和阿勒泰山北麓一带。至大元年“移军”之地,大抵就是至大三年元军的“戍边”前线。刘迎胜教授认为:“脱火赤的驻地,位于野

路线，与当年耶律楚材、丘处机西行类似，需要自称海南下翻越阿尔泰山，沿乌伦古河，向西南绕过“瀚海”（今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行走一千里左右。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过瀚海千余里，有不刺城”。此处的“不刺”，即“卜罗”的转音异译。^① 故从称海到“卜罗”，需花费五月至七月约两个月时间。若加上从汪古部到元军“戍边”处称海一带的时间，总共历时应超过三四个月。无独有偶，《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 1220 年丘处机携弟子觐见成吉思汗所行路线同样是先自漠南到漠北，西行翻越阿尔泰山，迤至乌伦古河一带，所用时间 5 个月以上。^② 至于去程时选择上述漠北称海路线，不仅是蒙元使臣军旅通常向西行走的驿站大干道，还与当时元朝迫使窝阔台后王察八儿归降后月赤察儿、脱禾出所率漠北军队进驻阿尔泰山一带的明显军事优势有关联。当时河西一带的元朝军队，仅在沙州以西附近驻防，在与察合台汗国的东、西对垒中其军事优势远不及漠北元军。去程选择途经漠北称海且“假卒五百人卫其行”，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比较合理，也容易藉月赤察儿、脱禾出等军事威慑而为敌方察合台汗国所接纳。

二是去程曾特别谈到镇戍阿尔泰山北麓的“淇阳王月赤察儿、丞相脱禾出八都假卒五百人卫其行”。但回程只字未提返回阿尔泰山北麓元军“戍边”处的任何情况。

三是回程颇迅速，自七月从殒所卜罗“奉枢以东”，八月即东归汪古部首领“也里可儿思其先茔”，合计花费一个月多时间。与去程相比，时间约减少一半。考虑到阔里吉思殒所卜罗，离前揭“黄兀儿于量站”（今新疆艾比湖一带）距离颇近。“奉枢以东”的人员归途改而利用前述“近川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东连甘肃沙州、肃州等，经中兴府路北和东胜等站道，返回汪古部，可能性较大。这样，比起去程，能将两次穿越瀚海（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今内、外蒙交界沙漠戈壁）减为一次（哈密力东西的沙漠石川），地近路捷，可以保证七月至八月一个多月内东归汪古部先茔。另，《长春真人西游记》载，1220 年丘处机一行沿“三太子”窝阔台所辟站道翻越阿尔泰山之际，“其山高大，深谷长坂”，“约行四程，连度五岭”，所乘车辆必须“命百骑挽绳悬轭以上，缚轮以下”。^③ 迁葬人员回程时与去程不同，需要驮运阔里吉思“龙沙木枢”。如此负重而行，肯定不太适宜沿翻越阿尔泰山的去程路线返回。

四是根据有关研究，清代自新疆奇台县到呼和浩特最快捷的商旅驼路，主要是从古城出发，向东经旱沟、苕苕湖、四十里井、大石头、巴里坤、石门子、上马涯，越大戈壁，穿星星峡，北上经马鬃山、公婆泉进入内蒙阿拉善盟、经巴彦淖尔盟，取道乌兰察布盟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即百灵庙），到呼和浩特（归化城）的“小草地”或“小西路”。所行路线大抵和元人“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东连甘肃沙州、肃州、中兴府路及东胜等站道相近。通常，取道外蒙乌里雅苏台的“大草地”或“大西路”，需要行走三个月，而改行“小草地”或“小西路”，则可以缩减 40 余日。^④ 是可佐证阔里吉思灵枢改行“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

① 孙沐涟和霍博一带。”（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 366 页）其中，霍博在阿勒泰山南麓，故此描述或为前揭仁宗延祐二年脱火赤军队奉命扫荡察合台汗国三个月之程后的情况。

①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云：“这里的不刺城，屡见于当时的西域史书和行纪之中，其地在今新疆艾比湖西面的博乐县境内。也就是刘郁《西使记》内的李罗城。”（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 页）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遗书》第 13 册，第 12 页 B、15 页 A、26 页 A。因丘处机是时 73 岁高龄，成吉思汗敕许“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故其旅程速度比较缓慢。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王国维校注，《王国维遗书》第 13 册，第 24 页 B。

④ 张军华：《奇台驼运业与近代丝绸之路》，《新疆地方志》2010 年第 2 期，第 62 页；余太山：《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51 页。

揽出去站”，东连甘肃沙州、肃州、中兴府路及东胜等站道，的确能减少近半时间，以保证七月至八月一个多月内东归汪古部先茔。

五是《成宪纲要》载：“至大四年，宣徽院奏准节该：‘哈刺火拙根底葡萄酒这几年交站般运有。为军情勾当的上头立下的站有，交运呵，不中。交骆驼每般运。又，火拙根底西番地面里做官的每、民户每，献到葡萄酒，交自己气力的。他每识者，休教铺马里来’。”^①这里的“哈刺火拙”，即火州，今吐鲁番之地。表明至大四年前后尽管火州（吐鲁番）一带仍然为察合台汗国所控制，但是元朝方面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和自火州东来的官民葡萄酒贡献运送等应当是畅通无阻的。另据刘迎胜教授的相关研究，武宗末仁宗初恰处于元朝廷与察合台汗国等前后剧烈战争之间的“十年和平”，这十年间，并未发生大批元军穿越上述石川沙漠征讨御敌的情况。至大三年阔里吉思之子术安派家臣偕 500 兵卒迁葬其父，能够深入到阿力麻里附近的察合台汗国腹地。此为这段时间元军武装人员进入察合台汗国境内迄今所见的唯一特例，“与元和察合台汗国之间边境安宁是分不开的”。^②迁葬人员及 500 士兵既然被允许自阿尔泰山北麓进入卜罗一带的察合台汗国腹地，那么回程改走“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等，也应当是被允许的。

此外，周密《回回沙碛》云：“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③周密之说，应该是转述经沙碛东来，“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的“回回”人士的话语，故而不会十分确切。此处的“回回国”，主要指中亚阿姆河下游为中心，领土涉及阿富汗、波斯的花刺子模国等。该国与沙州敦煌之间“所经道中”“沙碛数千里”，较为近便的恰恰应当是前述“西夏之西，近川黄兀儿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揽出去站”一线的戈壁石川。而“凡一月方能过此”语，又能够在某种意义上为前揭《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七月，达殓所……乃奉柩以东。八月，至也里可儿思其先茔”提供佐证。

《元史》卷 24《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四月丁卯载：“命中书省赈济甘肃过川军”。同年六月壬子又载：“敕甘肃省给过川军牛种农器，令屯田。”有关“甘肃过川军”的记录，仅见于《元史》上述两条。

笔者注意到，仁宗即位伊始至大四年四月前后，四川并无战事。况且，自世祖朝平定南宋后四川长期驻屯 13 个万户府以上的军队，迄成宗初，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亦置于川蜀，川蜀军队奉命赴甘肃以西征戍的相当多。甘肃一带尽管屯驻诸多军队以抵御笃哇等叛王，但元中叶自甘肃赴四川征戍的几乎绝迹。^④又兼，元代甘肃行省与当今的甘肃省不同，其辖区疆域并不和四川行省交界，甘、川二行省之间尚有陕西行省和吐蕃脱思麻宣慰司的若干路州相隔，自甘肃赴四川，似难称呼为“过川”。鉴于以上情况，至大四年四月“甘肃过川军”，指谓过四川的可能性极小。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未在“川”底下加横线，无疑是审慎和正确的。换言之，“甘肃过川军”所过之“川”，并非川蜀。与“甘肃过川军”之类的“入川”、“过川”可能发生联系的，倒是果真有前述亦集乃路以北和哈密力东西的两处石川戈壁。又，前揭《仁宗纪一》未提亦集乃路而仅言“甘肃过川军”，甘州、肃州二路距离亦集乃路在 1500 华里以上，故可基

① 《永乐大典》卷 19425，第 8 册，第 7285—7286 页。

② 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第 355、360 页。

③ 周密：《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38 页。

④ 参阅拙文：《元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考》，《历史研究》2010 年第 1 期。

本排除从亦集乃路纳怜站道“过川”的可能。

由于前有中书省奉命赈济，后有甘肃行省奉命给牛种农器以屯田，故仁宗即位伊始出现于元史本纪的“甘肃过川军”，似乎是件惊动朝廷的事情。另外，《元史·仁宗纪一》所载“甘肃过川军”本身，亦有两条细节值得回味思考：

其一，“甘肃过川军”时间上晚于至大三年迁葬阔里吉思八个月，而且至大三年八月迁葬结束后，迄今尚未见到甘肃一带其他任何元军“过川”的记载。

其二，仁宗特意命令中书省出面安排“甘肃过川军”赈济，又命令甘肃行省给牛种农器，让其在甘肃屯田，这似乎不太符合通常情况下甘肃行省屯田军队的惯例。假若该军队果真是迁葬阔里吉思骸骨东归的500人军士，上述安排倒是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因系跨行省假借的执行迁葬特殊任务的军队，理当给予格外重视；其进入甘肃行省境内后，500兵卒乘传全程护卫继续东行，既会给沿途站赤造成很大负担，也无甚必要。故在暂时停留甘肃和北返阿尔泰山西麓原“戍边”处之前，仁宗、中书省和甘肃行省就需要特别予以赈济、屯田等安排了。

鉴于以上诸条，《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四月和六月所载“甘肃过川军”的具体指谓，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前述奉命护送嗣赵王术安家臣西赴卜罗迁葬其父骸骨东归的500人军队。诚然，此说证据尚显单薄，带有一定推测成分，还需要搜集新的史料予以进一步印证。但它毕竟是这段时间元军500名以上武装人员进入察合台汗国境内的唯一见于记载的特例，而且时间、站道等因素亦能提供较多的支撑理由。在找不出其他反面证据以前，至少可以暂备一说。第二种可能是“甘肃过川军”为迁葬阔里吉思骸骨东归军队以外的另一次过川军事行动，后者更是缺乏任何其他史料予以印证。究竟哪种可能性大些，哪种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还是留待方家寻觅更为有力的证据再作出客观评判。

即便如此，至大四年四月“甘肃过川军”与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灵柩“过川”东归，同样穿越哈密力东西的戈壁石川，又是大致可以确定的。

〔作者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方 兴 责任编辑：李红岩）

of divination to prove he had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 “replace the king of Yin”.

A New Exploration of *Guochuān* and the *Guochuān* Army in the Northw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Yuan Dynasty

Li Zhian(29)

All the Yuan post roads (站道, Zhàndào) that linked to the deserts, including the Muling, the Naling, and the East and West Hamili Post Roads, had sections called 川 (*chuān*). At the time, the Mongol words čül~čöl were given a Chinese equivalent 川勒 (*chuānlè*; also *chuān*), which refers mainly to a “stony desert or rocky plain.” In the fourth year of Dade, when the envoys of the Prince of Mobei and the emperor’s son-in-law came south to report on the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northern region”, and when the army of the King of Chupai (朮伯大王) was ordered to march to Mobei, they “crossed *chuān*” or “entered *chuān*”. Here *chuān* undoubtedly means passing through the Naling Post Road in the rocky Gobi desert north of Yijinailu Road. This was the first rocky Gobi desert crossed by the northwest army and envoys, and also one of the three Naling Post Roads (the other two being Jiandu Naling Post Road in Yunnan and the Gansu Post Road) leading to the Lingbei provinces. Around the time of Emperor Renzong, the rocky Gobi desert in the East and West Hamili, which bordered the Yuan-controlled region and the Chagatai Khanate, was a route that had to be taken by the armies of both sides, as well as envoys and merchants, whether in war or peace. In the sixth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Yanyou of Emperor Renzong’s reign, when NQm-qQli, the proposed King Bin was ordered by the Emperor to march west to attack the Chagatai Khanate, his army “entered and crossed *chuān*,” or the second rocky Gobi desert. When, in the fourth month of the fourth year of Zhida of Emperor Wuzong’s reign, the “Gansu army passed across *chuān*”, the ‘*chuān*’ is not Sichuān, but the rocky Gobi plain east and west of Hamili. The same is true of the *chuān* passed by the coffin of Korguz, the son-in-law of the Wanggu (Onghut) tribe, when it was escorted back to the east.

The Investig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Deficits in the Yongzheng Emperor’s Reign—with a Discussion of Interest Relationships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Liu Fengyun(44)

Politics under the Yongzheng Emperor was well-known for its strictness and severity. Many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of the period are regarded as important measures in the Golden Age which extended from Kangxi to Qianlong. Among these measures, the investigation of fiscal deficits was the one pursued with the greatest force. Premised on assuring state interests, it was a large-scale economic investigation that targeted fiscal deficits and official